

战斗在敌人心脏的“长城通讯社”社长

徐涛

胡底是我党情报工作开拓者之一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辗转来到上海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中央特科成立后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决策下，胡底和李克农、钱壮飞设法打入国民党情报核心要害部门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，为党组织搜集了大量敌人情报，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三人被后人誉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“龙潭三杰”。

以演员身份投身革命

胡底幼年时聪颖活泼、勤奋好学，且为人慷慨，豁达大度。1923年，考入北京中国大学。1924年，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，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。二人从此来往密切，成为挚友。在大学期间，胡底结识了李大钊。在李大钊的帮助下，他阅读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等进步刊物，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，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，积极配合北京的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。钱壮飞结婚后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，胡底经常前来家中，畅谈革命理想。1925年，经钱壮飞内弟、中共党员张暹中介绍，20岁的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中共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，胡底进步很快。他张贴标语，散发传单，为革命日夜奔走，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。

1926年，钱壮飞、胡底和徐光华在北京护国寺路东的一处院落内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。以演员和导演的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。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，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，光华电影公司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据点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上了军阀的黑名单，受到通缉。于是他们一起离开北京，转移到上海。

和李克农、钱壮飞组成“三人小组”

胡底和钱壮飞到达上海后，由于这里的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，他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。

钱壮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，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。其间，他们终于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取得了联系，在该支部过组织生活。1928年春，胡底也为了维持生活，应聘进入电影公司。他奉



胡底

党组织的指示，拍摄的影片大多以侠客行为内容。敌特机关发现了胡底的革命者身份后，派出大批军警和密探前往电影公司抓人。胡底以其轻捷的技艺和不凡的武功穿堂走屋，跃出高墙，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，转移到杭州，和钱壮飞会合。

不久，胡底回到上海，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。二人本就认识，见面后引为知己。不久，李克农经胡底介绍，认识了钱壮飞。三人相约要以自己的才干，为党干一番事业。

钱壮飞告诉李克农，他考进的无线电训练班是陈立夫的亲信、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。这年冬天，徐恩曾就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，发现钱壮飞精明能干、才华出众，又是自己的湖州同乡，就把钱壮飞留在身边，担任秘书。钱壮飞向李克农提出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，扩充人员，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，派人打入内部。李克农迅速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共中央。周恩来指示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，设法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，并潜伏下来。经钱壮飞安排，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，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，于12月间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处，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。不久，又经钱壮飞推荐，胡底也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。

1929年底，徐恩曾告诉钱壮飞，他将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，准备着手扩建调查科特务组织，以配合共产党的军事“围剿”，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并叮嘱钱壮飞协助进行。钱壮飞立即将徐恩曾的意向向中共中央报告，请示如何工作。

周恩来当即指示：钱壮飞设法留在徐恩曾身边；李克农无线电管理局任编辑；胡底则打入新成立的调查科；三人编为一个特别小组，李克农任组长，由周恩来亲自指挥，与中共特二科科长陈廉庶联系。

钱壮飞得到指示后，设法把胡底安排进调查科。徐恩曾正式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后，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“密切配合”，立即呈请徐恩曾向国民党上层要求增加经费，以便“增设机构，扩充人员，充实内部，扩大影响”。徐恩曾见三人工作“卖力”，又处处“为自己着想”，于是欣然同意。随后，在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的努力下，调查科内又陆续被安插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：部分同志管理电台，部分同志担任秘书和会计职务。

钱壮飞得到指示后，设法把胡底安排进调查科。徐恩曾正式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后，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“密切配合”，立即呈请徐恩曾向国民党上层要求增加经费，以便“增设机构，扩充人员，充实内部，扩大影响”。徐恩曾见三人工作“卖力”，又处处“为自己着想”，于是欣然同意。随后，在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的努力下，调查科内又陆续被安插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：部分同志管理电台，部分同志担任秘书和会计职务。

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指导，向钱壮飞提出：当前任务，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，还要搜罗有关其他各地方实力派的情报，为此要大力建设覆盖全国的基层特务秘密机关。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根据中央特科“为我所用”的指示精神，立即着手“帮助”徐恩曾在全国各地建立

帮助敌人建立“情报网”

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指导，向钱壮飞提出：当前任务，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，还要搜罗有关其他各地方实力派的情报，为此要大力建设覆盖全国的基层特务秘密机关。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根据中央特科“为我所用”的指示精神，立即着手“帮助”徐恩曾在全国各地建立

战场上的承诺

浦迎春

篇后拾遗

我的父亲叫浦绍林，是云南宜良人，1950年10月，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赴朝参战，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。他当时任50军148师443团3营4连指导员，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和守卫西海岸战斗。在第四次战役的帽落山阻击战，父亲结识了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伯伯。父亲在后半生，常常给我讲起他们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：

1951年1月25日，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打响，父亲所在的50军奉命在汉江南岸、水原城以北的白云山区阻击企图夺回汉城的美军。父亲坚守的帽落山阵地与白云山西侧的白云寺仅一条公路之隔。美军仗仗着飞机掩护，坦克攻击，步兵轮番进攻，坚守白云寺阵地的447团八连陷入危急之中。2月1日，战斗正紧张进行着。坚守白云寺的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带着几个人匆忙来到浦绍林坚守的帽落山阵地上，一到阵地就高声喊道：要找阵地最高指挥员。浦绍林接到通信员报告后，赶紧过去，看到一位满脸胡子拉碴、浑身泥巴的人，穿着破了很多洞的大衣，露出的棉花黑白不一。

那年，浦绍林年仅21岁。戴汝吉早年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，长春起义时就是上尉副营长。他见来人像个娃娃，就问：“你们连干部呢？”浦绍林回答：“连长受伤，副连长牺牲了，我是指导员，有什么事，你尽管说。”



浦绍林在朝鲜战场



志愿军战斗英雄戴汝吉

他看了看浦绍林，亮出了身份证：“我是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。”“上级要我组织兵力依托你们阵地，对白云寺突入之敌实施反击。”

“有什么要求？”浦绍林问。戴汝吉说：“向你们借挺机枪，再给些子弹。”浦绍林没有任何犹豫，说：“机枪不借，我要送给你，你要一挺，我给你两挺，再送两箱子子弹。”

戴汝吉听完，又说：“我反击时，你从侧面组织火力支援我一下。”浦绍林坚定地回答：“没问题。”

这时，戴汝吉听到浦绍林的承诺后，身心有所放松。但又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：“如果我牺牲了，请代我向上级报告：就说我戴汝吉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对得起祖国人民。我不是党员，但我要求组织上在我牺牲后，追认我为中国

共产党党员！”浦绍林听后，对他说：“只要我活着，一定办得到！”这是一个为保家卫国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，用生命对不惧死亡战友的承诺。

说完这些话后，就在戴汝吉转身的刹那，浦绍林发现他眼角噙着一汪晶莹的泪花。浦绍林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没吃饭吧？”“两天没吃了。拿下白云寺再吃。”戴汝吉说完要走。

浦绍林一把拉住他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不吃饭我不给你机枪。”浦绍林按住他说：“我这儿有炒面，还有水。你用水和上炒面吃，就不噎嗓子了。你知道我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是通信员把雪装进水壶里，再放到朝阳的地方让太阳把雪融化。”戴汝吉看了他一眼，也没说个“谢”字，先把沾满泥巴的双手在满是泥

“情报网”。

三人先后在南京、天津、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社为掩护的情报机关，并将这三处特务机关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不久，徐恩曾命李克农到上海主持“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”工作；胡底在南京主持建立了特务机关“民智通讯社”，钱壮飞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“长江通讯社”，任社长。不久，胡底前往天津，创办“长城通讯社”，兼任社长。“长城通讯社”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，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。胡底到任后，很快将这个通讯社变成了中共设在北方的秘密情报站。他把搜集到的情报，经过密写处理后，连同申请到的经费，寄给钱壮飞。如有紧急情况，胡底就会以长城通讯社的名义，用密码电报拍发至钱壮飞处。

中央特科派出陈廉与李克农保持单线关系，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各自搜集的情报，需要汇总至李克农处，再由李克农转交陈廉。陈廉利用上海三明明照相馆老板的身份做掩护，常驻上海三明明照相馆（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）。一旦取得重要情报，李克农便立即来这里与陈廉接头，由陈廉把情报送至中共中央。

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，一个去天津，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红色情报“铁三角”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由三人党小组做出决定，分头执行。平时天津、上海有什么情况，胡底、李克农用密码发电报给钱壮飞，再由钱壮飞转陈廉向党中央汇报。1930年，发生了蒋介石和其他军阀的“北方大战”。胡底和钱壮飞利用这一时机，向徐恩曾提出，准备组织一个小组，“去东北，搞张学良的情报”，立即得到徐恩曾的应允，还批给他们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和通讯器材。胡底和钱壮飞到达北方后，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，将经费和通讯器材交给了当地党组织，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办的一系列任务。两个人回到南京，找了北方的一些小报，将上面刊登的文章拼凑成4万多字的东北军“情报汇总”，交给徐恩曾。徐恩曾看后赞不绝口：“真了不起！一下子就能搞来这些好材料！”

1931年4月，顾顺章叛变革命。钱壮飞截获并破译了相关电报，当即通知了李克农。李克农冒着危险找到陈廉，把消息送到周恩来处。当天晚上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上海所有的重要机关都实行了转移。

4月28日，胡底在天津分别收到李克农和钱壮飞“克、潮病笃”和“潮病重，速归”的电报。“克”指李克农，而“潮”指钱壮飞。胡底立即处理好身边事务，迅速返回上海，和李克农、钱壮飞会合。陈廉亲自为他们安排住所，严加保护。

1931年8月，三人先后抵达中央苏区，随即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）

巴的棉大衣上擦了两下，就抓起一把炒面放在左手心上，倒上点水，用沾有火药味的手和下巴就把塞进嘴里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吃完炒面，然后带着“借来”的机枪和两箱子子弹返回了阵地。

半小时后，戴汝吉率部队反击，浦绍林带领全连紧密配合，一举夺回了白云寺阵地。

在这次帽落山阻击战中，浦绍林和全连士兵奋战8昼夜，在连长、副连长先后负伤和牺牲的情况下，独自组织指挥战斗，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，全连148人，只剩下28人仍守住阵地，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。

战后，浦绍林所在连队被上级授予“能攻能守第四连”的光荣称号，个人荣立大功一次，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“三级国旗勋章”和朝鲜人民军军功章各一枚。

在夺回白云寺战斗之前，1月25日，戴汝吉带8连打入敌人心脏，并率18勇士，夜袭水原城，捣毁了敌指挥部，全歼美军宪兵一个排，毁战车七辆，迫使美军撤出水原城，立下卓著战功。在夺回白云寺后，2月3日，在坚守白云寺战斗中他身负重伤，被送回锦州治疗。4个月后又重返朝鲜前线。当年，《人民日报》等多家媒体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。为此，志愿军总部授予他“人民功臣”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他还荣立记大功一次、三等功一次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“三级国旗勋章”。

从此，浦绍林和戴汝吉两位云南人成了更加亲密的战友，两家也成为世交。1961年，戴汝吉转业到黑龙江省绥棱县工作。晚年回到家乡云南丽江，他把平时节俭积累的工资，捐给故乡母校——义尚小学。他去世后，1983年12月11日，丽江市人民政府将义尚小学命名为“汝吉小学”，并在校内建亭立碑，以纪念这位纳西族的英雄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浦绍林的女儿）

史海观澜

SHIHAIGUANLAN

丁秋生率鲁中军区第四团开展大练兵

吴昌荣

1941年，组织上派时任军工委程学校政委的丁秋生带领60余名干部，从延安奔赴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。丁秋生到达山东后，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。

1942年8月，第一旅改为第一五师教导第一旅，丁秋生仍任政治部主任。他积极协助旅政委王麓水，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，使全旅整风运动开展得扎扎实实，各级领导和机关作风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部队战斗力得到提高。

1943年4月，丁秋生任山东军区鲁中军区第四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上任之后，丁秋生和团长周长胜下到各营、连，调查了解指战员的实际情况。通过调查，丁秋生发现，这个团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武装改编、补充过来的，新兵多，骨干少，军事技术差。丁秋生随即召开团党委，研究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，从思想和军事两个方面进行整顿。

丁秋生提出“要整顿部队必先整顿干部”的主张。他组织大家学习，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，组织连队党支部重新选举，并注意言传身教，带头示范，使红军光荣传统在第四团得以发扬光大，部队面貌焕然一新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。同时总结历次战斗的经验教训，并责成团部制订训练计划，开展基础课目训练，尽快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。

在整顿思想、整顿组织的基础

史海观澜

SHIHAIGUANLAN

晋绥边区八分区军民“挤敌人”

徐轶

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位于晋绥根据地的中部，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日军对八分区经常发起“扫荡”与“蚕食”，并建立起深入八分区的岔口、芝兰等据点。为了打开斗争局面，中共晋绥分局决定以八分区为重点全面展开“挤敌人”的斗争。

八分区领导研究决定，从1943年2月至7月，集中优势兵力，“挤”掉岔口、芝兰两个敌据点，并作了如下部署：第一步，先从军事上入手，采取“敌进我进”的方针，积极主动，机动灵活地同日军斗争，做到打得准、打得狠；第二步，发动群众，开展反汉奸、反“维持会”斗争；第三步，迁移据点附近的居民，困死日军。随即，第八军分区派出两支武装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。

武工队和民兵还开展“冷枪战”，专打外出挑水、砍柴和巡逻的小股敌人，据点周围的群众把水井堵死，剪断敌人的电线。敌人需要喝水、吃饭，只能硬着头皮外出担水、捣浆，又害怕人少被袭击，于是每次外出，就会出动据点半数的兵力。八分区军民发现后，就制造各种“地雷”，在敌据点周围和交通线上大摆“地雷阵”，又炸死炸伤了不出外的日军。敌人只能躲在据点里，生活必需品全靠运输队补给。八分区军民选择主要交通线伏击，开展“麻雀战”，打击日军的运输队。据点里的敌人顽抗了一段时间，感到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。1943年7月21日，岔口、芝兰据点的日军敌人在大军的接应下，炸毁碉堡，狼狈而逃。八分区军民终于挤出了这股敌人，拔除了这两颗“钉子”。接着又用同样办法，除掉了多个据点，收复了大片被占土地。

岔口据点周围10公里以外的村庄消灭了“维持会”后，敌人加紧了据点附近群众的控制和压榨。中共

史海观澜

SHIHAIGUANLAN

工卫总队向敌人夺布制冬装

吴学军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日寇逼通平型关，紧急关头，太原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。1937年9月27日，在太原市国民师范校园内正式成立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。这支队伍由于有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工会组织的发动，仅一个多月时间，就有近千名工人参加了工人武装自卫队。

1938年9月，工卫总队开到文水、交城一带开辟敌后根据地。当时，正值冬季，部队服装奇缺。为了给部队战士制作冬装，工卫队领导决定袭击位于祁县南关的织布厂，具体行动由工卫旅二大队队长王化哲负责指挥。王化哲根据掌握的敌情，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：四、五、六中队和保安一支队在祁县北城门附近设伏，担负阻击祁县县城敌人和掩护运输人员撤退；文水县大队负责警戒文水县一带的敌人，并保卫通往文水边山道路畅通；晋中办事处百余人及二大队五中队、保安队各抽出一个排，负责消灭守敌，抢运布匹；同时还组织了70多辆马车作为运输工具，又动员修整了汾河渡口。9月11日深夜，部队从文水县胡家堡村出发，过汾河，从南谷丰、北谷丰之间直插织布厂。

祁县织布厂位于祁县的南关，是一个有三排瓦房的大院，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排的伪军，营房在大院